

以史為鑒看文革

熊景明

1976年9月，「紅太陽」隕落，神州靜悄悄，於無聲處聽驚雷。果然，不過二十九天後，「四人幫」被捕，其中最重要的成員乃毛澤東的未亡人，「文化大革命的偉大旗手江青同志」。毛對文革負主要責任是不容辯駁的事實，對毛的批判將引起的震盪無法預測。這尷尬局面在將近五年後，才找到折衷的解決方式。1981年6月27日，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通過〈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將文革定性為「一場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民間用「浩劫」形容剛過去的動盪。中國在十四年抗戰、四年內戰之後迎來不平靜的「和平時期」。共和國成立後的三十年，1949至1978年間政治運動不斷，多少人死於無辜，幾代人最好的年華在動盪中蹉跎過去。民眾只渴望過上太平的日子，既往不咎成為共識，驚魂甫定的國人，跟隨鄧小平「摸着石頭過河」。

對文革「後遺症」的處理，限於處罰、關押被認為需要對文革「打、砸、搶」事件負責者及所謂「三種人」（追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造反起家的人，幫派思想嚴重的人，打、砸、搶份子）。對1949年以來制度和政策的批判，乃至對共產主義運動在中國實踐的反思，雖然成為官方和民眾中多數人的共識，卻心照不宣。一些模糊的口號表達了當局覺今是而昨非，「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表示：實踐證

明，階級鬥爭、不斷革命的理論是錯誤的；毛澤東主導的各個政治運動被實踐證明是錯誤的（乃至犯罪）。三十多年來，民間思想言論的空間首度出現。不說只做的策略依然推動了1980年代的思想解放。獨立思考能力與創造力的釋放，是中國社會得以進步的根本。

文革是整個民族慘痛而沉重的教訓，不應當看成僅僅是某領導人的錯誤。很可惜，今天的年輕人大多將文革看成一場「走資派」和「造反派」之間的鬥爭，甚至以為是一場民眾狂歡或者百姓動亂。不明白為何中國人集體發神經，長達十年之久。同事、同學分為勢不兩立的兩派，打個你死我活，甚至打死自己的老師，告發自己的父母。本書作者大多為國內外資深的文革研究者，大部分經歷過文革，其中不少以文革研究為畢生志業（作者簡介見書末）。合力寫下這部《中外學者談文革》，旨在記錄文革，引證事例，講述過程，提供佐證，以反省制度、人性以及文化，希望藉歷史的燭光照亮未來。

一 文革發生的背景

2008至2012年間，胡錦濤總書記三次在黨的重要會議上提出「不折騰」的方針。這句用心良苦的隱喻難倒了新聞發佈會翻譯，即席創造一個英文字"bu zheteng"，引發網上的翻譯比賽。經歷過前三十年的人，都明白最貼近總書記原意的翻譯是"no political movements"，不搞政治運動。前三十年與後三十年（希望也是永遠的未來）最大不同在於稱之為毛澤東時代的前三十年，是一個運動不斷、折騰不息的社會。本書附有丁抒整理的，從1949到1966年文革發生前中國經歷的主要政治運動簡介：土地改革運動、鎮壓反革命運動、朝鮮戰爭和抗美援朝運動、「三反」運動、「五反」運動、農業合作化運動、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運動、反對胡風反革命集團運動和肅清反革命運動、反右運動、大躍進運動、人民公社運動、反右傾運動、「四清」運動。每個運動都令一批無辜民眾受難甚至失去生命，同時令民族元氣大傷。

上面列舉的政治運動，還沒有包括許多局部、規模相對不大的運動。這些大大小小的政治風暴，都可視為文革的前期準備。例如1960年代初學習毛澤東思想的運動，將毛的每句話奉為神諭。「打翻在地，再踏上一隻腳」、「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能那樣……溫良恭儉讓，革命是暴動」等毛主席的教導，乃是文革中紅衛兵高呼的口號，是他們行為的理據。

「階級與階級鬥爭」作為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的核心，據此制定的政策統領了中國三十年。林達的文章梳理了無產階級專政如何混淆了「罪與非罪」的概念。相當一部分人的公民權利被剝奪，甚至於將他們投入監獄或者槍斃，形成社會上人人自危的氣氛。專政對象不許亂說亂動，普通人也不敢「亂說亂動」。誰是專政的對象呢？這些「賤民」或者說「敵對份子」絕大多數的「罪名」，僅僅因為他們曾經擁有的社會地位，包括通過合法手段擁有土地或資本的富裕階層，或者曾經在國民政府擔任中級以上公務員、軍隊官兵。這些人背負着「地富反壞」（地主、富農、反革命、壞份子）的身份罪。當時中國有六億人，此類「二等公民」有兩千萬人。1954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規定：「國家依照法律在一定時期內剝奪封建地主和官僚資本家的政治權利」。僅1950至1952年，被處決的「四類份子」達70萬人。

此後每一次政治運動補充一批「階級敵人」。1958年反右運動增加了55萬各右派，大多數是單位裏業務出眾者、大學裏善思考的優秀學生。從此階級敵人的統稱變為「地富反壞右」，這些右派份子作為運動對象被打入另冊，甚至受牢獄之災或失去生命。他們的家人由於家庭出身或「社會關係」受牽連，林達稱之為「受迫害核心群體」。對整個民族而言，對精英的摧殘帶來的損失無法估量。

文革中，無產階級專政演變為「群眾專政」，為了自保或政治上進取，不乏人以對這些身份罪者的殘忍來證明自己的革命性。這些「五類份子」或者「四類份子」成為「紅色恐怖」的核心迫害對象，貫穿整個文革沒有改變，他們所承擔的罪名沒有改變，迫害的模式沒有改變，數量則在文革迅速擴大，迫害的嚴酷程度也前所未有的。

本書不少章節對文革具體事件的描述，證實了他的論點。毛澤東時代一方面是洗腦、一言堂；另一方面通過政治運動令敢於思索的發言者淪為專政對象。丁東的〈毛澤東時代的青年思想者〉闡述了這一時期言論控制如何逐步升級。幾位蘭州大學被打成右派的畢業生下放到農村後，了解到農民的苦況及成因，有感而發，自辦了兩期油印雜誌《星火》。相關43人全部被捕，判刑25人。1970年，主編及同情他們的縣委副書記被處以死刑。文章列舉了在如此高壓之下，思想者依然湧現。他們的言論如星火燎原，對解除億萬中國人的迷信起到至關緊要的作用。思想的統一、社會的共識，只能建立在對黑白是非的辨別、對歷史與現實真相的認識之上。

二 文革對文化及經濟的破壞

丁抒的文章描述文革中遍及城鄉的「橫掃一切舊習俗、舊文化」的「破四舊」運動。標誌舊文化的古建築、墳墓、寺廟，包括藏族地區的喇嘛寺被毀。運動不僅掃蕩歷史建築，也進入私人家中，就像法西斯黨衛隊隨意衝進猶太人家洗劫一般，紅衛兵成群結隊闖進被他們貼上各種各樣標籤的人家，翻箱倒櫃，將私人收藏的文物、書籍、古畫，或拿走充公，或當場焚燒，數萬人在「破四舊」中被打死。文章中列舉的那些令人心疼的數字與事實均來自公開出版物，包括上百部地方志。如今人們多已經忘記，1950年代大規模的土改運動中有過範圍更廣、更徹底的抄家運動。毛澤東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寫到「反對農會的土豪劣紳的家裏，一群人湧進去，殺豬出穀。土豪劣紳的小姐少奶奶的牙牀上，也可以踏上去滾一滾」。這樣的行為，被毛澤東讚揚為「好得很」。這篇文章也證明了「捉人戴高帽子遊鄉」早有先例，還不是文化大革命的發明。

摧殘文化的另一方面是對科技人員、學者等各種知識人和文化人的貶抑和迫害。丁東的〈文革中的中國知識份子〉分析了1949年以來

對知識精英階層的政策。政治運動，尤其是1957年的反右運動都以掃除這個階層的尊嚴，限制他們的思想為目的。文革中作為「臭老九」、「反動學術權威」的知識人及科技人才，和「走資派」一樣受到批鬥。不堪屈辱與折磨而選擇自殺者，以千萬計。1966至1976年，大學關門的十年，科研、文創及各種智力活動，基本停頓。全國人民只能觀看由江青主導的八個文藝劇碼，稱之為樣板戲，可謂中外歷史上絕無僅有的現象。

陳意新的文章指出，1950年代初農民分到的土地很快被「合作化」了，農民成了為國家生產糧食的勞動機器。農民被戶口制度釘牢在祖先的那片土地上，連大饑荒時期出去逃荒都被禁止。充滿恐嚇與暴力的「四清」運動是農村文革的前奏。文革時期「農業學大寨」運動，勞動強度空前，令農民苦不堪言。糧食產量下降，為城市提供的徵購任務必須完成，交完公糧後，所剩不足以果腹，大多數農民處於半飢餓狀態。不少人的回憶錄寫到，勞改釋放的農民要求留下，因為勞改隊吃得比家裏飽。階級鬥爭升溫造成某些農村地區的對所謂階級敵人的批鬥和集體屠殺。湖南道縣大屠殺中，受難者包括僅出生十天的嬰兒到七十八歲的老者。

楊繼繩分析了文革時期的經濟。毛時代將發展經濟、改善民生作為「走資本主義道路」批判，以解放全人類作為終極目標。而今對文革仍然充滿浪漫想像的人，也許不知道前三十年提倡「苦幹、大幹」，勒緊褲腰帶幹革命，反對追求物質生活，「以苦為樂，以苦為榮」（當然不包括領導者本人及特權階層）。文革中許多工廠停工，或半停工，「抓革命、促生產」的口號只有前半句在作用。所幸農民還在種地，城市居民有基本的口糧賴以生存，到後期，每月供應的糧食也很緊張，大饑荒時期的雜糧摻飯又回到飯桌上。最普通的副食品，糖、肉、豆腐成為奢侈品。農民的勞動強度隨着政治的高壓而增加，半飢半飽是常態。

三 文革中的年輕人

印紅標的文章講述了北京的大中學生如何被利用與操縱，將文革從理論批判推演成充斥暴力的紅衛兵運動。最具代表性的場面乃身穿父母舊軍裝、戴軍帽、腰繫皮帶的少男少女，穿大街過小巷，一路高呼：「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滾你媽的蛋！」「毛主席萬歲！萬萬歲！」他們響應毛主席的號召幹革命，衝進私人住宅抄家，開批鬥會，打老師……北京中學生到全國各地「煽風點火」，一時間，全國人都得效法這些少年人的狂熱，早晚唸《毛主席語錄》，跳「忠字舞」，社會無秩序，個人沒有安全感，無人料到如此的亂象與癡狂延續十年之久。

一代青少年，文革開始時成為運動主力軍。一批批來自全國各地的學生，在天安門接受毛主席檢閱，發誓緊跟偉大領袖。主席對一名女中學生的戲言「要武嘛」，讓全國各地造反派中好鬥好勇者得到了「最高指示」。那個時代，極少數人有條件出門旅行，因為工作分居兩地的夫婦一年見到一次，離家工作的子女數年才有條件回家探望父母。而一夜之間，中央下令，全國的中學、大學生可以免費去北京見毛主席。繼而「大串聯」開始，學生可以免費乘火車全國行走，各地設立紅衛兵接待站，免費提供食宿，為紅衛兵宣傳和鼓動文革提供方便。無須上學，免費旅遊的夢幻日子終有盡頭。到1968年底，革命小將從政治舞台上被推下來，強行送往農村，美其名曰「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實則被文革利用完畢後統統流放到窮困邊遠的農村。

讓這些五穀不分的人去務農，將千千萬萬家庭拆散，剝奪了年輕人受正規教育機會的非法、違反人性的舉措稱為「知青運動」。詩人食指寫過一首詩〈這是四點零八分的北京〉，記知青別故鄉的一剎那，令人想起杜甫的詩句「牽衣頓足攔道哭，哭聲直上干雲霄」。對這些孩子和他們家人，那是沒有歸期的離別。他們每個月的糧食供應連同戶口被注銷，不下鄉則要背上破壞上山下鄉運動的罪名。67、68、69屆的大學畢業生被送到解放軍部隊農場「接受鍛煉、改造」。「知識青年上

山下鄉」在中外歷史上均無先例，該政策影響了整整一代中國人，成為集體記憶。潘鳴嘯 (Michel Bonnin) 的文章介紹這一場特殊和複雜運動的來龍去脈，並分析了運動的成因及後果。王克明的個人經歷是生動的佐證，也顯示出某些地區知青在農村文革中的作用。

徐友漁的文章分析了毛時代年輕人的思想啟蒙，由革命小將到流放農村的經歷引起一些人的思考。帶領全國人民對毛澤東無限崇拜的副統帥林彪企圖投敵，動搖了年輕人宗教般的信仰。在迷惑中思考、懷疑舉國狂熱、探索真理的年輕人中，最了不起的是一位年僅24歲的青年工人遇羅克。他在「紅色恐怖」的年月寫下批駁「血統論」文章，呼喚常識理性。1970年3月5日遇羅克被槍斃。多少人付出生命的代價，才使得這一兩代中國人擺脫盲目的領袖崇拜，學習獨立思考；從造反有理到尊重法制，從你死我活的鬥爭到認同和諧、平等、友善的價值觀。

四 全國性的十年災難

與歷史上的動亂與戰亂不一樣，文革沒有前方後方。沒有一個縣、一個村莊，乃至一個家庭能夠倖免，只是程度不同而已。何蜀、宋永毅分別記述了文革武鬥最嚴重的兩個地區，重慶和廣西。在重慶武鬥中，那些準備為了保衛毛主席和黨中央犧牲性命的年輕人，在不同的兵器工廠和軍隊的支持下，彼此之間真槍實彈打起「內戰」。今天重慶沙坪壩文革死難者公墓的433座簡陋的墳墓中，埋着十幾歲到二十幾歲的逝者，見證一段不應當被忘卻的歷史。

宋永毅用官方編撰的史料描述了廣西文革時期人吃人、大規模槍殺無辜、大規模性暴力的事實。情節血腥恐怖，聽起來匪夷所思。曾經有大約9萬至20萬人被折磨致死或直接被槍殺。他們因家庭出身被列為階級異己份子的人，包括他們的孩子，也包括因文革派系被扣上罪名的民眾。種種酷刑，令人毛骨悚然。這些詳實的調查，作為內部

資料封存。今天廣西的年輕人，恐怕也無從知道家鄉的這段血腥往事。

民間學者李遜講述造反派奪取上海市委領導的「一月革命」，以及背後的內幕。這一文革中的標誌性事件，引發全國從各級行政機構到各單位的「奪權」，即由造反組織接管各政府機關部門，稱之為「全國山河一片紅」。文章說明權力的更換並沒有脫離「如來佛的掌心」，並非群眾組織的意圖或者他們的勝利。

五 文革的支柱

文革的亂象背後，有堅實的社會凝聚力和國家控制力。前者來自領袖人物的絕對權威及其群眾盲目崇拜，後者基於對軍隊的控制以及專政，即不必用法律作為依據的鎮壓手段。文革中，軍隊仍然穩穩地在黨和毛澤東的指揮下，絕度服從命令；專制之下，雖然愈來愈多的人開始懷疑，表面上仍舊必須服從。

丁凱文的文章講述軍隊是毛澤東發動文革的主要依靠力量。將軍人對毛澤東的絕對效忠，推廣為全民的效忠，以「忠不忠於毛主席」作為衡量一切是非的標準，在文革前就開始了。文革中軍隊是隨叫隨到的別動隊，控制學生派他們做「軍宣隊」，支持造反派讓軍隊去「支左」，大學畢業生送到軍墾農場接受鍛煉改造，地方政府癱瘓直接由軍隊接管。最具諷刺意味和戲劇性的是，文革的結束十分有戲劇性。林彪的兒子林立果，一名年輕軍官及其夥伴，寫出一份揭發最高領袖罪行的檄文〈五七一工程紀要〉，一篇大實話推倒一尊神。

魏昂德 (Andrew G. Walder) 回憶起1980年代初他到中國做訪問研究，就連剛認識的人，也爭相對他描述文革的瘋狂與不幸。有人舉起五根手指，搖動大拇指，笑道：「四人幫」。那是文革後老百姓一致看法。他的文章指出，文革發生的前提是領導層中一些人對毛的忠誠超過對黨的忠誠。毛利用這些人以及妻子江青做出人事佈局，控制宣傳

機器，借重林彪控制軍隊，最終摧毀黨的組織體系。中央文革小組實際上是毛的指揮部，暗中活動，動員群眾造反，形成情報網絡，但未能完全掌控局面。現在看到的文革研究，大部分都支持這一判斷，只不過無人像他這樣直言皇帝沒穿衣服。

文革中最普遍的現象是每個城市和縣、鄉，都有勢不兩立的兩大造反派。他們卻有共同的目標和誓言：誓死保衛毛主席，誓死保衛黨中央。他們胸前帶着毛主席像章，任何場合都舉着一本「紅寶書」：《毛主席語錄》。文革高潮時期，每天早上需要站在主席像前舉着小紅書進行「早請示」，晚上同樣的儀式稱之為「晚匯報」。如此的瘋狂與荒謬有兩個基礎，一是不得已的順從，再就是發自內心的個人崇拜。

馮客(Frank Dikötter)的文章分析了個人崇拜的歷史淵源，描述毛崇拜的各種荒誕現象。也許沒有人能夠理解或者分析這個文明古國何以集體陷入非理性。只能說，文革災難不再重演需要對制度的檢討，也需反思人性，需要家庭及學校教育強調獨立思考，尤其要避免個人崇拜。

六 個人及制度的反思

一樁惡行，往往由制度與人性之惡共同造成。西方有諺語道「人心中住着一個天使和一個魔鬼」，政治運動中為了自保、過關，心中的魔鬼被喚出來，去揭發、告密，甚至打人、殺人。楊顯惠寫的《夾邊溝記事》、艾曉明拍的《夾邊溝祭事》對此有生動具體的記載。彼此揭發的運動模式令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緊張。沒有運動的日子，政治之弦依然緊繃。各行各業的人，包括農民或學生都得花許多時間參加政治學習、開會、聽報告。無形的繩子捆住人的思維，左右人的行為，它叫做階級鬥爭。「階級鬥爭，一抓就靈」是控制思想言論，限制人們正當行為的法寶。

周汝仁曾經是文革時期的風流人物，為重慶兩大造反派之一「八一五派」最重要的筆桿子。階級鬥爭教育在這名求上進的好學生心中留下仇恨種子，他深信，「對敵人要像嚴冬一般殘酷」，敵人可以是他的同學、老師。他對領袖有着信徒般的景仰，願意跟隨毛主席幹革命，渴望成為拯救世界的天使，以生命為代價也在所不惜，文革中成為蔑視生命的狂熱份子，以無畏的勇氣拿起殺人的武器。他的反思不止於認識，之後他成為民間文革研究者，成績斐然。

王復興的故事幫助我們了解，家人之間為何因為政治而失卻親情。並非政治觀點不同，而是兒子害怕父親的「政治問題」影響自己的前程，不惜告發，與之劃清界限。父親來到他唸書的北大，兒子假裝是陌生人。父親是一位黨內知識份子，大半生受到組織的政治迫害。他們兄弟姐妹多年來不理會父親，令他每天受到來自親生兒女的「懲罰」。幸而父親活到文革結束，有機會接受兒子的一聲道歉。

德國從戰後至今，一直推行「非納粹化」運動。從公民教育入手，尤其針對學生，通過戰爭的描述，揭露戰爭殘酷和慘烈；通過講述受害者的悲慘境遇，揭露法西斯罪行，反省德國法西斯主義帶給世界人民的苦難；通過追溯和回憶，反思納粹德國的歷史以及德國人應當承擔的責任。德國總理默克爾 (Angela Merkel) 說：「每個德國人都必須反思自己在過去的作為和不作為。」這是一個痛苦的過程，但德國正視歷史的做法是對的，可以讓後代不重蹈覆轍。

中國的做法相反。秦暉指出，雖然徹底否定文革已經寫進黨的決議，卻漸漸避而不談，使得社會對文革的認識墮入誤區。將文革定性為毛主席發動人民群眾反對當權派的鬥爭之說，為不少人所接受，在對改革開放不滿的人群中尤為普遍。「擁毛反鄧」是毛粉的普遍意識，這是當今社會不穩定的隱患。站在當權派的立場上，自然會認為自己安安穩穩當官的前十七年是對的，文革是錯的。也有少數「民主派」置文革的巨大破壞不顧，認為文革體現了民主，值得肯定。第四種文革敘事追溯到對1949年後體制的反省，在文革學者中是主流。

在文革剛結束的1980年代初，徹底否定文革曾經是黨內一致的呼聲。1983年廣西組織了十萬黨政幹部，花了四年多時間，調查、處理文革遺留問題。宋永毅的文章便是基於十八卷廣西文革調查寫成。每一個省、市、縣都有足夠豐富的史料寫一部地方文革史，但現有的文革史料被封存。徐友漁多年前指出，文革發生在中國，而文革研究在境外。如今文革資料收集最齊全的圖書館和研究機構，都在境外。直到1990年代末，文革研究在國內雖然沒受到重視和鼓勵，但也沒有被禁止。今天則因為誰也不能理解的原因，國內關於文革的文字都不允許發表。

文革後的黨和政府啟動改革，從行動上否定了毛時代。先從經濟體制入手，解散人民公社，將土地使用權還給農民立見奇效。幾個收穫季節便結束了三十年來數億農民的半飢餓狀態。數年後，破天荒的，市民再不需要憑票買糧食、買肉、買豆腐。民營經濟得以擠進獨霸市場三十年的國營經濟，出現所謂「雙軌制」。法制建設、政治與行政制度的改革滯後，經濟運作缺乏規則和秩序管束，如脫韁野馬，讓人性的貪婪有空子可鑽。處於近水樓台的官員及其親友先富起來了，1980年代末，民間對「官倒」的怨恨引發一場學運。學生得到群眾的支持，天安門廣場迎來歷史上最絢爛的春天，人們興致高昂，感覺在參與創造歷史。壯闊而動人的場景通過傳媒呈現出來，感動了世界各地的華人，香港人尤甚。領導者誤判，加之街頭運動難免的弊端，和解的機會一再失去，當局採取最極端的手段鎮壓學運。曾經凝聚了多少人的期盼，狂歡節一般開始的運動以悲劇收場，歷史大倒退，對文革的公開的反思戛然而止。

七 走出毛時代

1976年10月江青被捕，1981年被判處死刑，緩期兩年執行。江青在審判庭上激動地高叫：「我就是毛主席的一條狗……在毛主席的

政治棋盤上，雖然我不過是一個卒子……」江青文革前是一位極為低調的第一夫人，文革中拿到尚方寶劍，囂張跋扈。誰都知道她根本沒有能耐去發動和主導文革，讓她為先夫背上罪名毫無理由，符合了電視宮廷劇對紅顏禍水的演繹。1991年5月江青在保外就醫期間自殺。想必她至死不能明白，丈夫的遺體躺在水晶棺材中供萬人敬仰，肖像掛在天安門城樓上，象徵他不變的精神領袖地位，他的遺孀卻因為遵從其旨意被判死刑。這也是許多中國人心中的疑問，是無法永久迴避的對歷史的叩問。

1977年7月召開的中共十屆三中全會，結束了1949年以來政治掛帥的毛時代。當時指導國家政策和個人行為的準則叫做「兩個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會議同時決定了新的國策：「停止使用『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口號，確立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四十年過去了，國家的經濟政策、外交政策今非昔比，政治改革雖然沒有提上日程，一系列行政改革，司法程序的改革，都逐步推進。法律上對私有財產的保護，表示放棄了前三十年的社會主義公有制度；取消對農民極不公平的戶口制度，亦是對前三十年的否定。最為意味深遠的改變，是取消了前三十年的階級劃分，取消保密的個人檔案制度。而今天的年輕人難以想像，你們的祖父母或父母當初升入初中、高中、大學的資格需要受到政治審查。如果此人的家庭屬於「剝削階級」，家人及親屬中有被關押、管制，或槍決的，無論學業成績如何，可能失去升學機會，或者只能進入次一等的學校。

按毛時代執政黨理解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消滅屬於剝削階級的地主、富農、資本家，沒收了他們的土地和財產是正當行為。這些被打倒的群體，農村的地主和富農、城市的資本家和實業家、知識份子中的思想者，曾經代表社會的先進生產力和先進文化。今天這個階層重新崛起，成為社會中堅。鄧小平有一句打破毛時代均貧政策的名言「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紅二代和官二代捷足先登，「地富反壞資(本家)」的後代佔先天優勢，成為這「一部分人」。有一則笑話道，某高

官將母親從鄉下接到北京。看到兒子豪華的住所，奢華的生活，老人家憂慮地說：「兒子啊，好是好，共產黨來了怎麼辦？」歷史給我們開了頗大的一個玩笑。

文革結束後，公開的文革反思及對毛時代的反思，雖然沒有大張旗鼓地進行，但經歷過文革的人，大都醒悟。在百廢待興的1980、90年代，痛陳文革災難很普遍。鄧小平認為毛的旗幟不能倒，在三中全會之後三個月，發表了「堅持四項原則」的講話，制止了全國一片要求批毛的呼聲。實際上，鄧小平、趙紫陽、胡耀邦等黨領導人，已經把對文革的否定延伸到了對文革前十七年的反思與否定。胡耀邦親自主持全國範圍的平反冤假錯案，不僅包括文革中的冤案，也包括前十七年積累的冤案。大量在鎮壓反革命、反右等運動中受到懲處的無辜者，此時得以恢復名譽。雖然國家沒有對歷次運動的受害者做出補償，也沒有人向他們道歉，平反本身已說明哪一方做錯了。

老百姓只求平安，甚至不願意對兒孫講述過往的遭遇，希望他們與政府同心同德，入黨入團。2000年以來，民間湧現回憶寫作風潮，公開出版以外，自費印刷供親友閱讀。許多經歷苦難者認為見證歷史是自己的職責，生平第一次提筆。不少作者為各個政治運動的倖存者，有人曾經九死一生。這些回憶錄共同的特點是不控訴，不宣揚仇恨，僅求以個人的遭遇警世。他們的經歷，往往超過文學家的想像，揭示出文化和人性中的善與惡。

文革結束，中國大陸在經受巨大的人為災難之後，得到教訓與警示：前三十年的根本政策必須改弦易轍，以求國泰民安、繁榮富強。長於書寫人類危機和時代創傷的作家石黑一雄，獲得2017年諾貝爾文學獎。他談及個人，「那種誠心誠意、想要為社會做貢獻的人，卻因為沒有自己的思考導致在周圍一片狂熱中成了幫兇，最後後悔不迭」；他談到國家與民族往往傾向埋葬不光彩的歷史。缺乏對真相的揭示，對歷史教訓的總結，慘劇可能重複。本書算是各位作者為不忘文革盡的一份努力。